

一九六零年前后,钱君匋老师创作了《长征印谱》,把红军经过的一百个地名镌刻上石。在全国都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重读钱老师的这部印谱,涌起无限的感慨。

钱老师在旧社会,主要的身份是出版商,极左时代被划为“剥削阶级一分子”。从老师,我在少年时代是学写字;从《长征印谱》始,我从他学篆刻。在我的记忆中,他和我父母一样,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尤其是钱老师,一有机会便讴歌共产党和工农大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请他赐刻了一个“如愿”。一定是他十分满意的作品,竟然刻了五面边款。说我学刻已入门径,他日不难成名成家。谆谆教导我“尤要者,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政治为艺术灵魂,如不偏废,他日定能如愿也”。我又请他赐刻一个大闲章“立异标新二月花”,边款上刻了“立社会主义之异,标共产主义之新,如二月百花齐放”。

那时,钱老师几次说起同科室的同事王科一。我读过他翻译的《傲慢与偏见》。老师极为赞赏那位王先生年轻有为。怜其白而专,不合时宜,在为其所刻姓名印的边侧,勒上“政治力迫印面赤,业高不废事工农”规劝之。

所以“文革”中,造反派斥钱老师是老反革命,实在是大冤枉了他。

在创作《长征印谱》前,先是做资本家,后来又做总编、副总编,忙忙碌碌。偶尔奏刀,业余爱好而已。相比前辈大印家赵叔公、王福公,甚至陈巨来文、邓散木先生等人,钱老师还只是票友。

一九五七年后,他为挂名的编年,空闲时间多了,上班时可读读字帖印谱,心临一番。钻入书法篆刻的世界里,乐不可支。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长征印谱》其实是他篆刻的分水岭。从普通的爱好者一跃成为一流印家。那时,他五十几岁,精力弥满。而且钱老师天才过人,书法篆刻的门门道道,一学就会,一会便精。远迈常人。

举《长征印谱》中的“打鼓山”(图一)为例。那是初钤本中的模样。把字典中查来的金文,即钟鼎文,机械安置在方块中。“打”的左右分离得太松,“鼓”字又局促不安。篆法、章法、刀法俱乏善可陈。

但是钱老师很快便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二年后,随着对金文的深入研究,改刻成了图二的面目。篆书风流跌宕,纯商周青铜器款识意;章法上穿插揖让,君子风度,颇有密不容针疏可走马之趣;刀法上痛快淋漓,大得青铜器文字的椎凿味。好极。

此印四面边款,用汉简体追

青铜器款识,高古奇拙,极为抢眼。许多评家,说老师的边款远超印面,见仁见智,也许也有道理。老师的边款,面目很多,篆隶正草无一不擅。尤其是汉简体,直来直去,朴素而富金石气息。

钱老师在篆刻上是认真的。从第一种原钤本到二年后的第三种原钤本,竟然重刻了一半以上的印面或边款。根据第三种原钤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线装本的《长征印谱》,时在一九六二年。其后,钱老师又不断修改,于十七年后,出版了第二版平装的《长征印谱》,是为定稿。

《长征印谱》的崇页,钱老师经叶恭绰先生之助,请康生题写。叶老还把康生的原信附来。康生说,钱君《长征印谱》,写刻俱佳,不胜钦佩,嘱题封面,草草交卷云。康生所题,经制版后,三种原钤本均采用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初版线装本《长征印谱》,采作封面签条,非常醒目。说句实话,倒也并不恶俗。第二版时,已是一九七九年,改为沈尹默先生的法书了。

原先,叶恭绰、潘伯鹰二先生都撰写了长序。叶序开头写了“解放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是长文,不好意思请老人重抄。只请他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钱老师把照片剪贴重排,印刷后,订入原钤本中。潘序写在竖式稿纸上,每行很长,也是照相后剪贴重排。所以都和原稿在款式上不一致。叶序虽用毛笔,却写在新闻纸上,钱老师不喜欢,所以差我去印刷厂照相制版后便送给了我。

也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早先,太老师丰子恺先生也题五言诗相贺——长征神圣地,印谱永流传。此是燕然石,纪功亿万年。制版后纳入第一种原钤本,不知什么原因,二、三三种的原钤本却弃而不用。不过,人民美术出版社二次正式出版的,都采用了丰老者的题诗,叶、潘的长序却不见了。

为了答谢康生,钱老师篆刻了“康生”、“三洗堂”(康之书斋)、“曹轶欧”(康妻),打算请郭沫若转呈。也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没有送出。

岁月匆匆,《长征印谱》已经成为历史。印刷本也成了稀罕物。幸亏原石仍在人间。真希望有心人发起制作第四种原钤本,因为这是最后的定稿,也是钱君匋老师成为大印家的一部标志性的巨著。



图二



图一



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红军,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这是发表在1936年《救国时报》连载作品《雪山草地行军记》上记述的一件红军趣事,作者杨定华,其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

红军开始长征前夕,刘英只有二十六岁,不到一米五高,娇小瘦弱,双眼奇大,如“洋布娃娃”。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

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他一道行军。当时红军规定极严,夫妇不能在一起。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寥寥无几,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

1936年9月,刘伯承与汪荣华于甘南休整期间结婚。地点在成县境内清源河畔的曲子镇,婚礼简单简朴。汪荣华于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时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与汪荣华婚后不到一周,于行军途中遇敌机空袭,两人刚卧倒,一炸弹于身边爆炸,刘臀部负伤,汪小腿

亦负伤。当时汪见刘伤重,心中焦急,刘安慰她说:“负伤没啥,革命哪有流血的!”

蹇先任和蹇先佛是长征路上一对姐妹花,她们的丈夫分别是贺龙和萧克。

1935年11月1日,贺龙

女兵的风姿

吴东峰

和蹇先任的孩子贺捷生诞生了。当时贺龙不在身边,姐夫萧克在附近找到一个遗弃的破房子,作为产妇的产房。姐姐蹇先佛已经提前来到妹妹身边照顾。蹇先任生一女,贺龙闻讯大喜,请萧克取名。当时,二、六军团会师后连战连捷,突破国军重兵围困,长驱直入湖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调寄“八声甘州”

王军胜

四渡赤水

惯乘虚避实巧周旋,用兵宛如神。善声东击西,奇招迭出,难料佯真。自古兵家无数,高手有几人?辗转三千里,历尽艰辛。

破敌娄山关下,夺新城遵义,捷报频频。白军无计施,月下夜惊魂。渡乌江、贵阳告急。赤水河,处处设迷津。金沙畔,笑狂飙浪,难挡红军。

过雪山草地

赞奇男子盖世红军,百战威名扬。历千山万水,风餐露宿,冒雨披霜。北上宣言抗日,人气倍高涨。斗雪山寒彻,草地饥肠。

有为牺牲壮志,煮草根皮带,且当军粮。众同仇敌忾,图转弱为强。有分歧、求同存异,计周全、先避祸萧墙。回头看、叹英明策,天下无双。

到达拉斯维加斯,就为接下来游览科罗拉多大峡谷纠结。本想游南大峡谷说那里风景优美可看可读性强,也就报了去南峡的名,到第二天清晨却接到通知,名额满了无法前往,耽误了一天时间。迫使你不得不作出决定,只有去西峡一条路,尤为像“独上华山一条路”。赶快报了游西峡的名。

所谓游大峡谷是沿科罗拉多河两岸挑景点优美地方匆匆走走。科罗拉多河是美国西南方至墨西哥西北方河流,发源于落基山脉,横跨科罗拉多州等好几个州,最终流入墨西哥境内的墨西哥湾。最杰出的自然风光莫过于科罗拉多州内数亿年变化和雕琢风化的大峡谷,它的神秘在于穿越亚利桑那州的高原沙漠和变幻莫测的狭长峪谷规模宏大气势恢弘。如果想在短时间内游览美国大峡谷和科罗拉多河,选择乘坐直升机观赏简便安全。

一大早,我们便从拉斯维加斯出发,颠簸行程五小时终于来到了能够在空中欣赏大峡谷和科罗拉多河的直升机停机坪。同团有两个年轻母亲各带小孩一女一男,整个老年团中有两小孩颇感年轻有活力,一路相伴有笑声,两孩子英语口语特好,有时我们有困难还求他们帮忙呢。坐直升机游览分六人一组,要称体重和大人小孩分别组合。按顺序登

机,当大家拿到登机手环时,团里小男孩突然哭泣不已,大家为之一震。原来他想坐前排驾驶座上,能更好欣赏科罗拉多大峡谷美景。问题来了,按规定,登机前是不能临时换位子的,主要考虑安全为前提,原来直升机飞行过程中平衡最为重要,事先安排座位已经考虑了乘客体重的平衡。也就是安全系数。

阳光直照苦等数时盼到登直升飞机时,小男孩情绪依旧不稳。有时想大人觉得无所谓的事情,孩子们却特别较真,这是童真。登上直升机,随着飞机轰鸣声我们上了蓝天,科罗拉多大峡谷尽收眼底。一览众山小,总共十几分钟的飞行,令人穿越历史时空。其实座位靠窗与否并不重要,直升机舱四周全是透明玻璃,全景式一览无遗,可心里还是害怕的,毕竟是第一次坐直升飞机观光啊!

“每当夜晚我在萤火旁幻想,仿佛回到家乡的山冈上”。《科罗拉多河上月光》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美国民谣。飞行过程中耳麦中立体声不正是播放的这首乐曲吗。兀鹫伴随着直升飞机一同翱翔这种美妙无法形容。



南中西部。萧克笑呵呵回答:“捷生,打仗仗时生的”贺龙抱拳谢道:“好,又响亮又有意义,秀才就是秀才。”出生不到20天的贺捷生,成为这支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

“秀才”萧克没有想到,他漂亮妻子蹇先佛也怀孕了。当时红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次年7月初,部队正过草地,萧克在一处牛场遗址为她围出三米见方的一块空地,四面的“墙”约有一米五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萧克称牛场遗址为土堡,故为孩子取名为“堡生”。

“堡生”没有“捷生”命好。1936年底堡生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在那场灾难中死了万余人。

最近,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引发了我对中国诗歌的一点思考,相对于新诗而言,流行歌词是否更有资格做“现代诗”?

中国的诗歌最早都是可以演唱的,《诗经》里记载的篇章在起初都有曲可依,一直到早期的汉乐府,音乐始终是诗歌必不可少的载体。诗人、学者公木先生曾将中国诗歌分为“诵诗”和“歌诗”,以能歌和不能歌作为区别。“歌诗”出自民间,流行于街头巷尾,到了文人手里逐渐走向雅化和纯粹化,偏重于语言形式和文字效果而渐渐脱离音乐的束缚,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这是一种文学发展的表现。但诗歌离开音乐,离开民间土壤久了,也会在文人手中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辞藻堆砌、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的文字游戏。

通俗和流行并不排斥对艺术和美的追求,在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上,歌诗与诵诗始终并行不悖地发展着。从诗经、乐府到南北朝民歌,都不乏既朗朗上口,又具有艺术美感的作品。唐诗也有相当一部分能够入乐,比如“旗亭画壁”的故事就记载了名人诗句在民间演唱的情况,这也是当时诗歌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另一方面,歌诗、诵诗交替发展,也推动了诗体的演变。当唐诗走到技巧纯熟、典故绵密的晚唐,句式整齐的格律诗渐渐式微,一种流行于民间、更易抒情的“曲子词”开启了新时代的诗体潮流。“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以见柳永的词在北宋的传唱盛景,而当宋词走到文人化的极端,王沂孙、吴文英等南宋词人的作品因为写得太精致、太“隔”而被不少批评家所诟病,一种新的流行歌词形式“散曲”又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诗歌迎来元曲的新纪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其文学价值是否能与诵诗相当,至少在传播范围和活力上,歌诗是远远大于诵诗的,因为它出自民间、通俗易懂,更能引起大众的共鸣,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儿”。在对于鲍勃·迪伦获奖的报道中,最为值得人注意的一点是,鲍勃·迪伦是最近十年知名度最高、拥有最多拥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管是否真如评委会所说,“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至少,他比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人更有群众基础,作品更加深入人心。试问,除了莫言之外,中国的观众还听说过哪些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并且知道他们写了什么?

尽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前景令人担忧,新诗始终成就有限。不可否认,新诗曾诞生过大量优秀作品,也在文学史上有着它的地位,但中国的新诗一开始就出自文人之手,是在西方文化涌入后的产物。新诗缺少民间土壤的孕育,没有传统的根基,许多新诗甚至不考虑押韵,不讲语法,靠评论家的解释来确立文学价值,只在小圈子里自我欣赏。

与之相对的歌诗方面,众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词也应引起学者和评论界的重视。如果剔除其中的商业气息,流行歌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势就是与时代、生活结合紧密,并且通俗易懂,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受众群体。香港词作家黄霭、林夕的不少作品被人们奉为“经典”,前不久,华语歌曲“词坛泰斗”庄奴的去世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思考。庄奴曾创作《甜蜜蜜》《小城故事》《又见炊烟》等歌曲,在华人世界中几代传唱,他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歌词不能太长、太难,我们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写歌,要简单易懂,又要传情达意,要写出他们的心声。”这样的创作,难道不与宋词、元曲,不与柳永、关汉卿一脉相承?但是,庄奴在当代,也许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文学地位。

一个诗体从孕育萌芽到为人广泛接受,需要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从汉乐府到文人化五言诗的产生,到中晚唐曲子词出现到宋词的兴盛,词中都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无论是新诗、旧体诗词还是流行歌词,谁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诗体”,也许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检验。据说,诺贝尔奖官方至今联系不上鲍勃·迪伦,看来这位听众民谣歌手并不看重这一学术认可,因为他无需诺奖给自己带来更广泛的受众和更高的人气。但无论如何,多元社会呼唤多元文化的可能性,诺奖的这一决定,无疑更加激励当代的诗歌与音乐爱好者共同创作和探索,随着时间的积累,一种新的诗体也许可以从慢慢淘洗出来。

钟

菡

流行歌词为何不能做「现代诗」?

